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爱德华·伯恩斯坦著

(供内部参考)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爱德华·伯恩斯坦著

殷叙彝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Eduard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Neue, verbesserte und ergänzte Ausgabe
Zweite Auflage

Stuttgart, J. H. W. Dietz Nachfolger/Berlin,
Buchhandlung Vorwärts. 1921

根据斯图加特和柏林一九二〇年德文修订增补

第二版一九二一年第二次印刷本译出

[143](3)3K9.5/B45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德〕爱德华·伯恩斯坦著

殷叙彝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65年2月第1版

1973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 3002·117 每册 0.85 元

内部发行

原书扉頁題詞

“因此，十小时工作的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

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①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 11—12 頁。——譯者注

譯 者 序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綱領，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理論与实践进行了全面的、系統的攻击和修正。列宁指出，伯恩施坦这部“最平凡的作品，却有特出的政治意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①

—

爱德华·伯恩施坦于一八五〇年出生于一个犹太血統的德国人家庭。父亲起初是白铁匠，后来做了火車司机。伯父阿隆·伯恩施坦是著名的资产階級自由主义者，《柏林人民报》的创办人。一八六六年，伯恩施坦在中学还没有毕业时就进銀行作学徒，四年期滿后在柏林的一家銀行当职员，从一八七一年直到一八七八年。

伯恩施坦在青年时期曾經受到资产階級軟弱的反普魯士君主专制运动的影响，具有一些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但是他对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毫不关心，对于欧洲和德国的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更无所知曉，連巴黎公社，他也“很少知道它的消息”。只是由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一八七一年的英勇的反战斗爭使他感到欽佩，他才开始参加社会民主工人党所組織的活动，閱讀

^① 《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 43 頁。

了爱森納赫綱領和旁听了关于它的討論。一八七二年四月，伯恩施坦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

入党初期，伯恩施坦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拉薩尔和杜林的机会主义。伯恩施坦对于他們的思想同馬克思主义的根本对立一窍不通。他认为拉薩尔用通俗的語言介紹了馬克思的思想，只不过“在某些方面把它庸俗化了”。至于杜林，伯恩施坦很欣賞他的著作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形式”以及“他对社会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因素的有力強調”，竟认为他同馬克思之間的理論分歧是不重要的。一八七二年秋天杜林的《国民經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出版后，伯恩施坦曾經积极地向党的领导人散发了这本后来受到恩格斯的毁灭性批判的著作。

在实践方面，伯恩施坦受到了党的机会主义領袖之一伊格納茲·奧艾尔的賞識，在他的培养和指引下参加了党的宣传工作。

伯恩施坦在党內的初期活动证明，他属于列宁所說的在“和平”时期欧洲社会党內部积累起来的“小資產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垃圾”之列。这一类人可以在合法活动中写文章和发表演說，侈談社会主义原則，实际上却是資產阶级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者，一到危急关头他們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伯恩施坦正是这样。在社会党人法公布后的党内危机时期，他第一次暴露了自己的右傾机会主义面目。

一八七八年十月，德国俾斯麦政府頒布“鎮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通常簡称“社会党人法”)，党实际上被剝夺了一切进行合法的組織和宣传工作的权利，不得不轉入地下。大批黨員被捕或被放逐国外。党内出現了取消主义傾向，企图把革命的战斗的党变成一个小資產阶级的改良的党，依靠俾斯麦政府的“恩惠”而維持合法的存在。伯恩施坦和另外两个党內的右傾机会主义者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合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

集中表达了这一取消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思想。

社会党人法颁布后不久，伯恩斯坦就经过施拉姆的介绍，到瑞士担任赫希柏格的私人文学秘书。一八七九年七月，在莱比锡新成立的党的领导机构指定他们三人在苏黎世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即将在那里创办的党报的筹备工作和财务管理。但是他们利用当时党的领导中存在的动摇和分歧，竟自封为报纸的编辑委员会，要把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新的党报。伯恩斯坦在给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推荐、准备担任报纸编辑的卡尔·希尔施的信中大摆官僚架子，指示报纸只“应当采取原则的社会主义方针”，不许“热中于政治激进主义”，以致希尔施愤而拒绝这一职务。《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的，它全面地说明了这个三人团准备在党报中贯彻并且通过党报在党内贯彻的路线的内容和实质。

这篇文章以三颗星号为署名登载在赫希柏格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第一期上。文章公然要求社会民主党改变性质，不要做“片面的”工人阶级政党，要大批吸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成为由“有教养的”、“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来领导的全面的党；它宣称党在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已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要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并且劝告党采取“平静”和“慎重”的态度对待现存制度，以讨好俾斯麦政府和资产阶级；它要党无限期地延缓纲领的实现，以全副精力来从事补缀和改良工作，这实际上已是后来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思想的萌芽；最后，这篇文章甚至丧心病狂地责备党要对社会党人法的施行负一定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憎恨”，这是它用“不大乖的行动给自己讨来的一根鞭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篇文章是三人团“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新报纸的真正纲领”。

这时，在伦敦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了解到三人团的活动并且見到了这篇文章，立刻写了一封通过倍倍尔給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傳閱的通告信，揭露三人团企图篡夺党报領導的阴谋，对他們的反党言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通告信指出，三人团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党內的“异己分子”和“冒牌貨”，他們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企图以此来改造无产阶级政党；他們用关于妥协、和解和博爱的空話来抹杀、冲淡和削弱阶级斗争，用改良来取消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党如果听任这些人占据领导职位，就是自己出卖自己，让自己受到閹割；如果新的党报采取他們的立場，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两位导师严正地表示，如果情况发展到这一地步，他們将拒絕給报纸写稿，甚至断絕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

通告信在党的领导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鞭策下，党的领导譴責了三人团的文章，把他們排除出新党报即《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委员会。恩格斯在事后說：“党内一班文人先生曾企图在党里造成一种反动的轉变，但他們結果却大遭失敗。”同时他也預言，在社会党人法废除之后，这一班人“会形成一个右翼而脫离出去”。^①

伯恩施坦受了这个严重的打击，气焰暂时收敛了，表现出向左轉的傾向。因此，当一八八〇年十二月福尔馬尔辞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时，倍倍尔决定由伯恩施坦接替，并且帶他一同去伦敦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改变三人团事件給两位导师造成的恶劣印象，爭取他們的支持。伯恩施坦从一八八一年一月起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一八八八年与該报一同迁到伦敦），直到一八九〇年該报停刊为止。此后他担任了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駐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二十七卷第 223—224 頁。

伦敦的記者和中央理論刊物《新时代》的常任撰稿人。在这一期間，由于在和恩格斯的通信和直接交往中不断得到指示和帮助，伯恩施坦在宣传方面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因此在党内赢得了“理論家”的虛名，也为他后来的反党活动撈取了資本。

二

但是伯恩施坦的資產階級世界观並沒有真正轉變，只是暫時隱藏了起來。特別是在移居英國以後，伯恩施坦受到了工聯主義和費邊主義的很大影響，機會主義思想逐漸重新抬頭，不時在他的言論中暴露出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英國的工業繁榮“敗壞了工人的意識”，使英國無產階級“日益資產階級化”，並且將造成一個“資產階級式的無產階級”。至於費邊社，那是“一伙野心家”，一個各色“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集團”；“害怕革命，這是他們的基本原則”；他們抹殺階級鬥爭，並且因此仇恨主張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他們的目的是保障“有教養的人”對工人運動的領導權。伯恩施坦沒有聽從這些教導，卻同工聯領袖和費邊社分子臭味相投，把他們當作自己的榜樣。他在自傳中說，他正是根據所見到的英國社會經濟情況和從費邊社“學到了一些東西”，從而改變了自己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展能力”的看法。

一八九一年到一八九三年間，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寫了幾篇文章批評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舒爾采-格弗尼茨和沃爾夫的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經濟著作。但是他事後承認，他實際上同意舒爾采-格弗尼茨關於“英國面臨着一個社會和平的時代”的論斷，認為“這至少並不是不可能的”。他也承認，這些著作已經使他对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和滅亡規律的學說發生懷疑，九十年

代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出现的经济繁荣又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动摇。他甚至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攻击《资本论》第三卷（一八九四年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胡说，认为马克思在这一卷中改变了他在第一卷中的若干结论。一八九四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农业问题展开争论时，他倾向于大卫、福尔马尔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对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没落的命运表示怀疑。

在伯恩斯坦这几年写的文章中也表现出对议会主义和细小改良的浓厚兴趣。例如，他在一八九〇年四月写了《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一文，劝告党不要低估议会政治的重要意义，要敢于冒“受议会痴毒素传染”的危险，并且必须懂得“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的”。一八九三年他又写文章大谈“卫生事业的国有化”，并且竟在其中说，所谓“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目前社会正日益发展着将成为社会主义基础的那些“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的因素”。这时恩格斯发觉了伯恩斯坦的这一倾向，他在一八九三年十月的一封信中评论伯恩斯坦说：“他仍然没有做到他所应该做到的那个样子。他现在热中于琐碎的问题，而且越来越象他那位在《柏林人民报》的伯父了。”^①

这时德国国内政治形势也出现了变化。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党人法的统治下仍旧在工人运动特别是选举斗争中不断取得重大的胜利，德国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恐怖政策丧失了信心。一八九〇年一月，帝国议会以大多数否决了延长社会党人法的法案，俾斯麦政府接着于三月倒台，继之而起的卡普里维政府采取了所谓自由主义的“新方针”。资产阶级统治手段的这一转变使社会民主党中的合法主义和议会主义幻想迅速发展起来。在议会党团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二十九卷第252页。

不断出現否定革命道路的言論。一八九一年二月，机会主义分子格里林伯尔格在議會讲台上公开宣称，党从来没有同意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同年六月和七月，福尔馬尔两次在慕尼黑的“黄金国”大厅的集会上发表演說(后来以《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为题出版)，公然要求党改变路綫。福尔馬尔认为，在政府改变了政策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也应当相应地改变策略：“从前的僵局松弛了，古老的冰块融解了，許多一直被束縛住的力量开始发芽和活动了，……对于一切种类的变化和改良的抵抗被冲破了”；“对善意要伸出手来，对恶意要給以拳头！”福尔馬尔鼓吹緩慢的、逐步的、有組織的发展，提倡建立在“实际情况的坚实基础”上的策略，“力求通过实际的局部成就这个唯一可能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改良主义行动綱領。福尔馬尔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答复对他的批評时声称：“对我来说，主要的任务是滿足人民直接的需要和实现最近的要求，……因为在我看来，逐步社会主义化是自然而然規定出来的进步发展的道路。”

福尔馬尔的机会主义言論实际上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先驅，是党内新的右傾危机的信号。但是党的領導对于这一危机缺乏警惕。一八九一年九月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对福尔馬尔采取了寬容的态度，仅仅略加批評了事。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在柏林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決議虽然是針對福尔馬尔的，却連他的名字也不敢提一下。尽管恩格斯一再指出福尔馬尔已完全丧失了社会民主党員的立場，要求党同他决裂。但是党中央始終对他采取調和主义的态度，听任他留在党内并且窃据領導职位，繼續以机会主义毒素来腐蝕和瓦解党。

福尔馬尔問題說明右傾机会主义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內已經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对机会主义者來說，从理論上全面修正馬克思主义的时机已經来到了。伯恩施坦主义正是适应这一形势而

产生的。如果說，在苏黎世三人团时期，伯恩施坦的反党言論采取了露骨的投降主义和取消主义形式，那末这时伯恩施坦已經“成熟了”，他用馬克思主义詞句的外衣精巧地裝飾了自己的反馬克思主义言論，形成了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

三

一八九五年八月，恩格斯逝世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馬克思逝世以后又一次遭受了十分巨大的損失，但是对于伯恩施坦來說，摆脱这位导师的监督，却是一个对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的求之不得的机会。

恩格斯逝世后的第二年即一八九六年，伯恩施坦为柏林狄茨出版社审阅瑞士历史学家路易斯·赫尔梯尔的《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史》。他对这本书作了一些評注，并且写了《法兰西共和国是怎样灭亡的》一文。他疯狂地攻击馬克思所认为的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領袖布朗基和布朗基主义者，說他們是“俱乐部煽动家”和力求建立专政的“恐怖主义者”，是他們吓坏了资产阶级，促使资产阶级轉向反动，因此六月屠杀应当由他們負責。这已經是赤裸裸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論了。接着，他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問題》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开始全面地修正馬克思主义。他在第一篇文章《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中反对明确划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界限，否认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是通过突变實現的。稍后，他在《阶级斗争和妥协》（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文中歪曲历史事实，大肆鼓吹同资产阶级妥协。一八九八年一月的《崩溃論和殖民政策》一文，更号召改变党的策略，提出了“运动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公式。

他在这篇文章中宣称，各国社会民主党內正在出現着一个重

大的变化，对于资本主义总崩溃的兴趣减低了，人们关心的是，“探讨当前问题的细节，寻求在当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沿社会主义方向朝前发展的杠杆和着力点”。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时所依据的前提已经改变，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阶级斗争缓和化，作为社会革命前导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大为减少甚至根本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党也应当改变策略。通过革命来一举消灭资本主义只能造成大灾难，相反，在目前社会中已经有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社会主义。他由此得出结论说：

“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而所谓运动，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至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面目已经毕露无遗。“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话从此风行一时，成了修正主义的“格言”，它“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①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广大党员的严重不满。他们纷纷写信给《新时代》编辑部表示反对，迫使编辑部停止发表《社会主义问题》的以下各篇文章。他们还要求党的执委会把伯恩施坦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讨论，一部分党员还要求把他开除出党。

一八九八年十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在斯图加特召开。由于党的执委会还没有足够地认识伯恩施坦言论的实质和危险，因此关于批判伯恩施坦的问题没有列入大会议程。伯恩施坦反而先发制人，给大会寄去了一封书面声明，为自己的修正主义言论辩护，公然攻击《共产党宣言》的许多结论是错误的，并且狂妄地声称要蔑视党代表大会的裁决，决不放弃自己的反马克思

①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19页。

思主义信念。

在大会討論策略問題时，蔡特金和卢森堡尖銳地提出了伯恩施坦問題。蔡特金說，对伯恩施坦关于目的和运动的見解“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如果贊同伯恩施坦的观点，那我們势必不再把資本主义社会中的斗争重点放在夺取政权上，而是放在爭取伯恩施坦所认为的为社会主义社会作准备的細小的社会現象上”。卢森堡指出，“夺取政权始終是最終目的，而最終目的始終是斗争的灵魂，工人階級沒有理由站在‘最終目的对我來說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种哲学家的頹废立場上；不，相反，与最終目的无关的运动本身，即作为自在目的的运动对我來說是微不足道的，最終目的对我來說就是一切”。倍倍尔在会上宣讀了伯恩施坦的声明，然后說：“我并不站在伯恩施坦的立場上，在主要問題方面我是反对他的。”威廉·李卜克內西指出伯恩施坦是被英国資本主义的发展懾服了，“如果伯恩施坦的观点是正确的，那末我們就要摒弃我們的綱領、傳統和整个社会民主党。我們將不成为一个无产階級政党”。

另一方面，奥艾尔、福尔馬尔、沃尔夫岡·海涅等机会主义分子发言支持伯恩施坦。考茨基作了調和主义的发言。他表示不贊成伯恩施坦，却又說：“伯恩施坦並沒有使我們喪失信心，而是促使我們思考。为此我們應該感謝他。”

大会沒有就伯恩施坦問題作出結論。倍倍尔指出，“同伯恩施坦的分歧不仅是一个策略問題，而且是关系着我們全部基本观点的問題。因此用一次党代表大会是不能彻底解决的。今后应当在党的报刊上进行对此是贊成还是反对的討論”。斯图加特大会的討論說明，党远沒有把伯恩施坦問題提到应有的高度，沒有揭示他的言論的階級实质，沒有从思想上和理論上給以彻底的批判，更談不到从組織上同他划清界限了。

会后，考茨基和奥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維克多·阿德勒等写信給伯恩施坦，希望他写一本书更加清楚地說明自己的观点。伯恩施坦听从了这一建議。一八九九年一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一臭名昭著的著作就出籠了。

四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部冒充科学的作品，实际上只是用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教授学者們的反馬克思主义“理論”拼凑起来的大杂燴。倍倍尔說得好：“他(伯恩施坦)的思想，他的批評，他所建議的道路，全都是几十年来資產階級方面和社会主义方面屢次說过的，因此他的著作不过是这一切思想的混合物而已。”伯恩施坦自己也一再声称，“我的話大部分不过是重复別人說过的东西”；如果把他自己的“先驅者”的名字开列出来，会得到一张很长的名单，“在这名单上可以找到所有国家、所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当代的社会主义者和前几代的社会主义者”。

在哲学方面，伯恩施坦追随資產階級教授，辱罵革命的辯证法，宣揚平靜的进化論，并且大肆吹捧折衷主义。在政治經濟学方面，伯恩施坦企图用柏姆—巴維克的价值論来修正馬克思的价值論，同时拿所謂“經濟发展中的新材料”来迷惑群众，否定关于資本主义危机的理論。在政治上，伯恩施坦完全滾到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立場，企图取消階級斗争，提倡无产階級同資產階級妥协和結成联盟，鼓吹和平过渡，反对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

伯恩施坦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成經濟唯物主义，攻击“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然后歪曲恩格斯关于上层建筑和經濟基础的辯证关系的观点，主张把二者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等量齐观。他据此

公然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论证社会主义”，并且宣称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伯恩施坦攻击辩证法使人陷入“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诬蔑关于对立要经过突变才能消除、社会主义要经过革命的变革才能实现的思想是“笨拙的、粗野的和卑劣的”，是“盲动”。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和制定策略时，正是因为没有摆脱辩证观点才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是“黑格尔矛盾辩证法的残余的产物”，因此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不难看出，伯恩施坦之所以攻击辩证法，正是为了制造反对暴力革命、修正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的哲学论据。

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党性，抹杀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界限。他嘲笑主张党性的人说：“似乎科学社会主义的十分之九的元素不是采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似乎居然有一种党的科学！”他认为各种科学都“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伯恩施坦还为折衷主义大肆吹嘘，说什么为了理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必须求助于综合的或者折衷的方法”，折衷主义是“清醒的理智”对于任何把思想“用脚镣锁起来”的倾向的反叛。

伯恩施坦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即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他硬说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同资产阶级的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并无不同，因为“二者都以现实的关系为基础，但是二者都建筑在抽象之上”。他攻击劳动价值学说成了“对于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

伯恩施坦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日益集中，生产日益过剩，工人日益贫困，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经济危机在较长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发生。他美化各种壑

断組織，說它們“意味着一切从来的对抗生产过剩的手段的提高”，已經可以起减少危机的作用。根据这样的观点，伯恩施坦得出結論說，資本主义的矛盾是趋于緩和而不是趋于尖銳了，“社会关系的尖銳化並沒有按《共产党宣言》所描繪的那样实现”，資本主义的經濟崩潰是不可能的。

伯恩施坦的哲学和經濟观点在政治上必然导致这样的結論：資產階級社会的政治矛盾以及从而无产階級革命的可能性（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社会和政治突变的可能性）不是愈來愈大，而是愈來愈小。因此他认为，革命的策略已經过时，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应当歸結为“創造一些状态和先决条件”，以此来“促成和保证現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痙攣性爆发的情况下轉移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这就是說，通过改良使資本主义和平地轉變为社会主義。

伯恩施坦誣蔑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論是“布朗基主义”。他认为，“在过高估計革命暴力对于現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創造力这一点上，馬克思主义从来沒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見解”；“《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行动綱領是彻头彻尾布朗基主义的”。在給本书一九二〇年的新版所写的跋中，伯恩施坦攻击布尔什維主义是“一种粗暴化了的馬克思主义”，是“对于野蛮暴力的創造力量的过高估計”。

伯恩施坦竭力美化資產階級专政，同时恶毒地攻击无产階級专政。他拿所謂“純粹民主”（实际上是資產階級专政）来和階級专政（在这里是指无产階級专政）对比。他认为民主“在原則上是階級統治的消灭”，資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是“有伸縮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毀它們”。工人階級通过普选权就可以取得政权，“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識的增长，它（普选权）就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轉变成人民的真正僕人的工具”。至于所謂“階